

弦外集

李希凡著

2
2-1

新文藝出版社

弦 外 集

李 希 凡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共包含十一篇文章，对古代的作品琵琶记、水浒传和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艺术分析，在论述中，作者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对别人的某些看法提出商讨。末后两篇文章，是论述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奥勃洛摩夫中的一个人物和康濯的春种秋收中的人物描写的。

弦 外 集

李 希 凡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 号 134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3/4 插页 2 字数 98,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定价(7) 0.44元

目 次

“阿Q正傳”簡論·····	1
关于“阿Q正傳”·····	13
典型新論質疑·····	33
作家的主觀和作品的客觀·····	48
赵五娘和“琵琶記”·····	67
“水滸”的作者与“水滸”的長篇結構·····	79
“水滸”的細节描写与性格·····	97
談豹子头林冲·····	106
略談“水滸”評價問題·····	115
典型人物的創造·····	123
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物的頌歌·····	134
后記·····	149

“阿Q正傳”簡論

阿Q正傳是中国新文学奠基者鲁迅的偉大作品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阿Q正傳是具有特殊风格的中篇，共分九章。第一章序，是阿Q姓名身世的概述；第二章优胜記略和第三章續优胜記略，是对于阿Q性格的主要精神特点的描繪；第四章恋爱的悲劇，第五章生計問題和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是描写阿Q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遭遇；第七章革命，第八章不准革命和第九章大团圆，是描写阿Q在革命中的性格变化及其結局的。故事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未庄。全篇富有性格发展史的特点，在故事发展上，沒有严格的时间 and 事件的順序，故事和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性格而存在，沒有貫串全篇的独立的特色。

但是，这篇富有性格描繪特色的小說，却是在极其广闊的历史时代的背景上展开的。它的人物的典型性格，精神状态和生活命运，以及通过人物性格反映出来的社会矛盾，都富有极其广闊的社会意义。它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暴露了在双重压迫和剝削下农民失业和破产的悲惨命运。然而，作为一部最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反映出来的最深刻的时代的社会的意义，是集中在解剖沉

重的黑暗統治所形成的時代的精神病態——阿Q精神，以及對於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而這一切又都是透過阿Q這樣一個成功的典型人物的活動而體現出來的。自從阿Q出現在文壇上，阿Q精神，阿Q性，精神勝利法等等，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普通名詞流傳在人們的口語里，人們用它作為鞭撻落後精神狀態的有力武器。那麼，阿Q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的典型性格，它究竟反映著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呢？

阿Q是個流浪雇農，“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從生活地位來看，阿Q受過慘重的剝削，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資格，甚至失去了姓名。因為酒後失口說出了自己姓趙，結果不僅左頰上挨了巴掌，還謝了地保二百文錢。因為觸犯了禮教的陋規，向“小孤孀”吳媽求了一次愛，鬧了場戀愛悲劇，結果生活的悲劇也襲來了，不只是弄得“抵押”，“赤膊”，余資蕩盡，而且弄得聲名狼藉，被未莊人畏如虎狼，再也找不到活計做了，最後是做了小偷。阿Q的生活道路，雖然並不完全是當時所有農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生活遭遇來看，阿Q的被壓迫，被剝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運，却是廣大農民階級共有的。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侵入，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封建稅賦的增加，土地的集中，給農民帶來了失業、飢餓的悲慘生活，我們都在阿Q的生活遭遇中找到了新的反映。

如果僅僅從阿Q的生活地位來看，阿Q是一個最受壓迫的人。一個最受壓迫的人，似乎也應該反抗性最強，但是，阿Q的性格卻並不這樣簡單。在他的一生的“行狀”里，他的其

抗是採取着被歪曲的形式，甚至可以說是反抗的反面，即使最後的傾向革命，也還是摻雜着許多糊塗思想，並且是做了革命的犧牲品。究竟是什麼東西牢縛住了這個令人戰栗的靈魂？究竟是什麼東西把這個痛苦的、愚昧的、然而又是純真而可笑的農民，導向滅亡的道路，使他不能覺醒起來積極反抗？這就是偉大作家魯迅通過阿Q的典型性格揭示出來，而且給以无情解剖的阿Q精神。

阿Q雖處於被剝削被侮辱的最悲慘的地位，他却並不自覺，生活的折磨和統治者的精神毒害，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種精神麻痺症，即對於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健忘，對於屈辱的精神勝利的自譬自解。阿Q一生痛苦的“行狀”，本來是最屈辱的奴隸的血淚史。而在他的自譬自解中，卻成了全是勝利，得意的記錄。他失去了生產資料，處於慘痛的被剝削的地位，他却用“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什麼東西！”“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這些或者是屬於過去的“榮耀”，或者是屬於未來的空想來寬慰自己。他對於村里那兩位“大受居民的尊敬”的趙太爺，錢太爺，並不十分“崇奉”，這自然是下層人民的自尊心。可是，這種自尊心也並沒有變成仇恨和反抗統治者的力量，相反的，也在精神勝利的自譬自解里消逝了。“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鏗鏘的報到村里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还比秀才長三輩呢。”他自以為是可以泄恨了。結果却在左頰上挨了一記，連“抗辯”也不敢抗辯地“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他仇恨錢太爺的兒子假洋鬼子，叫他“禿兒，驢”，而這對他也並不是什麼“報

仇”，但是罵完了以后，“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一顿“哭丧棒”，受了这番屈辱，也并没有激起阿Q的反抗，他倒觉得“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结果是“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阿Q对于受屈辱，自然不是毫无反抗，他是曾经反抗过的。为了忌讳自己癞疮疤的缺点，阿Q曾对那些愚弄他的人，“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却总是他吃亏，于是，他只好渐渐地变成怒目而视，而怒目主义也不能取胜时，他却又想出了自譬自解的“你还不配”的结论来。这样一来，癞头疮，也变成了他独有的高尚的光荣的标帜了。就是这样，闲人还不饶他，还要揪住他的辫子在墙壁上碰几个响头，阿Q似乎应该承认失败了。可事实出人意料之外，阿Q仍然有他的胜利法宝，被打了以后，“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当这个胜利的法宝也被人窥破，硬逼他说：“人打畜生”的时候，他也依然有他的精神胜利的自譬自解：“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从自尊开始，终结于自轻自贱，这本来是对立的兩极端，阿Q却能把它們用“第一个”统一起来，这都说明了，阿Q精神胜利的自譬自解，目的在于掩饰自己的失败，逃避现实加给他的屈辱，以便苟且求全下去。

除去精神胜利法，阿Q也还有取得实际胜利的妙诀。即在

受辱或失敗之后，向比他更弱的人去泄恨。有一回阿Q竟被他看不起的王胡揪住辮子照例在牆上去碰頭，還有一回他吃了他平生最厭惡的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的虧，這可是受了最大的侮辱了，正在晦氣的時候，不料迎面來了一個小尼姑。於是，他找到了發泄的對象。“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了你！”他跑上前去，伸出手去摩小尼姑新剃的頭皮，並且扭着她的面頰，很得意的說：“和尚動得，我動不得？”阿Q的這次助業，博得了未庄酒店的人的大笑。而他自己也由於這樣一次實際的勝利“早忘卻了王胡，也忘卻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

阿Q精神狀態的這幾個方面——對於屈辱和傷痛的健忘，自輕自賤的精神勝利，受辱或失敗之后向比他更弱的人去泄恨，這一切也可以說是他“反抗”現實的手段，但是，對於最受壓迫的阿Q來說，這種受到歪曲的反抗——精神勝利，只能有一個作用，即用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來模糊和忘卻受壓迫的殘酷現實。交織在這個複雜的典型性格里的這種精神麻痺症，它的反抗和屈辱，反映出了辛亥革命時代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深刻的社會矛盾。作為一個典型，阿Q的精神麻痺症，自然是屬於兩隻腳深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里的農民，幾千年來，他們經受着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封建壓迫，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商品和巨炮，又使得他們的落后的生產方式土崩瓦解，被剝削，被壓迫，被損害，被愚弄的命運，是愈來愈沉重地壓在他們的頭上，而在歷次屈辱和反抗終究還是失敗的鬥爭里，封建統治文治武治的武器，也不可避免地給他們添上奴隸精神的陰暗面，因此，最受壓迫，最受剝削的阿Q，沾

染上这种腐敗墮落的思想意識，形成了精神上的麻痹状态，这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淵源的。偉大作家魯迅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写出阿Q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但是，从阿Q典型性格的时代意义来看，从阿Q精神病态的深度来看，其深厚的根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階級，而是普遍地留存在整个历史时代的各个階級的通病，它有着高度的概括性。阿Q的精神麻痹症，只是这种时代的精神病态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反映，而阿Q精神的實質，却是这个时代所共有的，只是在各个階級的成員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現而已。記得阿Q正傳發表了几年以后，在現代評論上涵廬的閑話里，就曾有過這樣的記載：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隱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聲明不是罵他。

這一段簡單的記載，非常生動地說明了阿Q典型的深刻的時代意義，阿Q不僅是一個特定階級的典型，而且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時代的綜合的典型。在帝國主義瘋狂侵略的時代，清朝統治者那種對內殘酷壓迫，對外奴顏婢膝的態度；在遭受侵略時的那種可笑的辯解：“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

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的物質文明虽高，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早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說的云云”，受到了屈辱和失敗之后，用这种心造的胜利，来寬慰自己，在当时，从飞黃騰达的官僚到所謂讀書明礼的士大夫，和整个时代走下坡路的人們，都共有着这种精神状态。因此，阿Q正傳一出，就那样激动了許多縉紳人物，是不足怪的，——阿Q沾染着他們的精神毒害，也概括着他們的精神状态。阿Q，这是一个震顫时代的“灵魂”。

就是在阿Q正傳里，阿Q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未庄的社会，就正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縮影。从未庄人的精神状态里，我們可以找到孕育阿Q精神的典型环境。

阿Q鬧了一場恋爱悲剧以后，在未庄失去了工作和存身的处所，不能够活下去了，只有进城去另寻生計。到了那年的中秋，阿Q又回来了。突然以新的面目出現在酒店的門前：穿着“新夾襖”，腰間还挂着一个“大搭連”，这大大改变了未庄人对阿Q的看法。因为未庄有个老例：“看見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所以掌櫃堂倌，酒客，路人，对阿Q都表示出一种“疑而且敬”的神气来。平素欺侮他的赵司晨，和打过他的王胡，也都来傾听他的中兴史，甚至連赵太爷和秀才，也都聞而起敬起来。但是，后来知道了阿Q原来是一个偷儿，尤其因为他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就突然又改变了态度，不独“敬而远之”，并且認為是“斯亦不足畏也矣”了，难道这些人的精神面貌和阿Q精神有什么差別嗎？

生活在未庄的人們，有和阿Q同样命运的王胡和小D，他們和阿Q一样，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彼此漠不关心，这些人

物同样可以用阿Q的形象来写照。未庄社会的另一组人物，当地有权有势的赵太爷，錢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还有他們的帮閑赵白眼，赵司晨，这些人物除去他們吸血者的特色，其倚强凌弱，上諂下驕的丑态，那是較之愚昧而又有些純朴的阿Q，更加富有“阿Q相”的。

在阿Q的“行狀”里，那位备受人們尊敬的赵太爷，曾經出現过兩副面孔。

第一副面孔出現在阿Q自称是赵太爷本家的場面上，赵太爷一見阿Q，便大发雷霆：

“阿Q，你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搶进几步說：“你敢胡說！我怎么会像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給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这是一副多么驕橫霸道的面孔！

后来革命襲来了。阿Q喝了几碗酒，忽然覺得自己是革命党了。大喊“造反了！造反了！”沿着未庄奔跑，遇見了赵太爷，这时又出現了另外一副面孔。

赵府上的兩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結起来，以为是一

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唱。“得，鏘，鏘令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才站住，歪著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象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惴惴的說，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著自去了。

從不許姓趙，到稱呼老Q，從威風凜凜的打嘴巴，到“怯怯的迎着低聲的叫”，這兩副面孔的描繪，雖然是簡略的勾勒，卻活畫出一幅瞬息萬變的卑劣的奴才相。

至於假洋鬼子和那位秀才，只看那一段對他們向革命投機的描寫，就足以窺其性格的全貌了。平時作威作福，倚強凌弱，革命來了，於是，他們也看風使舵，“咸與維新”，把辮子盤在頂上，進城用四塊洋錢買了一塊“柿油黨（自由黨）”的銀桃子，掛在大襟上。就憑着這種“咸與維新”的投機，不僅革掉了靜修庵里“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打了老尼姑，偷了宣德爐，而且不許阿Q革命，陷害阿Q于無辜。

我們很難給未庄社會畫出一個完整的輪廓，還是借用一下被解上法場的阿Q的自己一段心理感觸吧！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里，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腦里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見一只餓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象兩顆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見从来没有見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气，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受尽剝削、压迫、凌辱和愚弄的阿Q，在痛苦生命的終結的时候，才从实生活里幻化出他所生存的世界的图画，实际上是在生前就已吃掉了他的靈魂，最后还吃掉了他的皮肉的未庄社会——阿Q生存的典型环境，孕育和生产阿Q精神的人間关系。而它也正是偉大作家魯迅在他的作品里，一再强烈控訴的“无声的中国”的旧时代。

如果說，作为精神悲剧形象的阿Q，是黑暗統治历史磐石重压的結果，那么，作为现实人生悲剧形象的阿Q，却是辛亥革命的牺牲品。由于殘酷生活的折磨，由于奴隶主义、失敗主义的精神毒害，造成了阿Q深沉的精神麻痹症，大大地歪曲了他对受压迫现实的反抗。但是，这个令人战栗的靈魂，毕竟是处于一种非人的地位。这种非人的地位，就不能不誘引他对于人的生活的向往，因此，社会关系中的任何激蕩，也就不能不波及到阿Q的精神变化。

辛亥革命襲来了，阿Q虽然对于革命有許多糊涂的看法，

甚至还承襲着封建統治者的观点：“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是，当他知道“百里聞名的举人老爷”也害怕革命，平素压迫和欺凌他的“未庄的一群鳥男女”，也为了革命“慌張”起来，他的自发的反抗意識就开始苏醒了：“‘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当这种自发的反抗意識一开始在阿Q思想上发生作用的时候，他就异乎寻常地振奋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兴，燭火象元夜似的閃閃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而这种振奋也立即影响到行动上来，他积极寻找和革命的联系，見了赵太爷們也揚眉吐气起来。阿Q所幻想的革命，很相象于过去的农民暴动，有些地方是糊涂和可笑的。但是，辛亥革命在未庄所引起的震动，却只有在阿Q身上激起了积极的神往。尽管这种神往掺杂着許多糊涂观念，它却是从被压迫階級本性里閃耀出的可以培植和发展的革命的火花。然而，辛亥革命对整个社会关系，只是“略一震动”，沒有发动广大的农民，也沒有实现他們的革命要求。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并沒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帶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作威作福欺凌和压迫阿Q的假洋鬼子和秀才，也开始向革命投机，封建官僚，士紳士和洋紳士，又都搖身一变，攫取了新政权，这就是辛亥革命后最典型最鮮明的画面。辛亥革命失败了，而真正倾向于革命的阿Q，却不仅“不准革命”，并且还做了被“革”的对象。被抓去当做搶匪枪斃了。

通过阿Q革命的悲剧，鲁迅极其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

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封建階級妥協，廣大的農民仍舊壓在封建磐石下面，犧牲了象阿Q這樣的傾向於革命的農民，這就是這個革命沒有獲得群眾基礎的深刻的歷史悲劇。

從以上對於阿Q典型性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偉大的作家魯迅，是企圖通過阿Q這個典型揭露和批判黑暗的封建統治對於人民的壓迫剝削以及精神毒害，促使人民勇於洗滌自己的靈魂，從事革命的戰鬥。但是，對於阿Q這樣一個形象，作者並沒有把創造它的基础，局限在農民階級的特性上，他是企圖通過農民的阿Q，創造出一個辛亥革命時代的“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對於腐蝕着那個時代的普遍的精神麻痺症——阿Q精神，魯迅是給以憤怒的鞭撻的，但是，在這種憤怒的鞭撻後面，也正隱藏着偉大作家的深厚的人間愛。對於雇農阿Q遭遇的悲慘的生活命運，殘酷的壓迫，以及嚴重的精神毒害，魯迅是充滿了同情和悲憤的。而也正因为在阿Q正傳里，滲透着偉大作家的愛國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深厚的思想感情，才使得阿Q正傳獲得如此高度的思想和藝術的價值，才使得阿Q正傳成為一部劃時代的傑作，記錄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

1956.8.6 為紀念魯迅逝世 20 周年作

关于“阿Q正傳”

列宁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一文里曾經說過：“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来”^①。这一段經典式的名言，可以說是总结了文学現象历史发展的規律，成为馬克思主义文艺学檢定和評价一个作家的原則。但是，每一个作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和他自己的阶级立場的不同，因而，时代的革命的脉搏，在作品中的反映，也就会有强和弱的差别。

生長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叶的中国最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魯迅，在时代的革命的脉搏上，表現出来的强烈的振动，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見的。魯迅是一个偉大的启蒙主义者，“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又是一个跨过了启蒙主义阶段，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基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文学生涯（一九〇七——一九三六）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而他遺留下来的文学財富，却給两个銜接的革命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勾画出鮮明的輪廓。在文学創作上，他不仅以杰出的貢獻——文艺性的政論和杂文，显示出他的时代的革命的特色，而且以他的呐喊和彷徨这两本在艺术成就上至今无与伦比的小說集，强烈地映照出历史的真实